

河北临城南盘石遗址考古发掘新收获

南盘石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南盘石村村北，抵河南岸的台地上。遗址所在台地面积约为5.3万平方米。1988年12月为配合河北省文物地图集的编纂工作，河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抵河流域的多处遗址进行调查，其中南盘石遗址亦在本次调查之列。此次调查将遗址定名为“北台遗址”。调查发现房基1座、墓葬2座，其中一墓发现完整陶釜1件，在釜内叠放两个陶釜，应为随葬品。遗物以陶器为主，亦有石球、石磨棒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鼎、钵、盆、釜、罐、瓶等。从出土遗物判断遗址包含仰韶和战国两个时期遗存，之后该遗址处于原址保护状态。因考古实习工作需要，2023年12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与临城县文物保管所对该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和小范围勘探。2024年8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师范大学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邢台市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临城县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盘石遗址进行了为期四个多月的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工作。本次发掘面积约310平方米。发现房址4座、灰坑45个、竖穴土坑墓5座、瓮棺葬3座、灰沟5条。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石、骨、蚌、角器等。现将2024年度的发掘工作及主要收获概述如下。

地层堆积

南盘石遗址古代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早期地层遭到后期的破坏。根据发掘情况，可将发掘区的地层划分如下：

- 第①层：耕土层。棕褐色砂质黏土，土质疏松。厚0.13~0.3米。包含物有陶片、红烧土块、兽骨、石块、瓷片、植物根茎和现代遗物。
- 第②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遍布整个发掘区，可分为两个亚层。第②A层：棕褐色砂质黏土，土质较致密。厚0.15~0.51米。包含物有陶片、红烧土块、钙质结核、碳屑和零碎兽骨。第②B层：土质土色与②A层相似，基本不见红烧土颗粒。厚0.1~0.48米。包含物有夹砂陶片、石块和少许炭屑等。
- 第③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黄褐色砂土，土质疏松。厚0.32~0.6米。包含物有泥质红褐陶片，红烧土颗粒等。本层包含遗物很少。

遗迹遗物

此次发掘的遗存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其他时期遗存少见。本文主要介绍新石器时代遗存。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并结合周边其他遗址的发现情况，可将南盘石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 本期发现的遗迹数量不多，仅见灰坑一种。以H48、H52为代表，H48坑口呈椭圆形，坑内堆积可分为两层：第1层为灰黄色砂质黏土，土质紧密，包含物有陶盆、碳屑、牛骨等；第2层为黄褐色砂土，土质较致密，包含物有碳屑等，未见陶片。H52坑口近圆形，坑壁较缓，填土为灰褐色土，土质疏松。有一直腹盆倒扣在坑内。这一时期的陶器仅见直腹盆一种，为夹砂红褐陶，直口、方唇、平底，口沿下装饰有戳印纹，各不相同，有的戳印的圆孔未穿透器壁，有的为窝状，椭圆形，也有长条状，“Y”字形等。均为手制，制作较为粗糙，显示出一定的原始性。在地层中也散见这一时期的陶器残片，基本分布在整个发掘区。

第二期遗存 这一时期的遗存是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遗迹遗物最为丰富。有房址、灰坑、墓葬、瓮棺葬等。

房址发现4座，F1平面形状呈葫芦形，其余3座大致呈椭圆形，均为半地穴式。F1、F2底部凹凸不平，分成不同的小平面。F3、F4底部相对平整，在F4的底部有一层踩路面，平整光滑。围绕周壁有数量不等的横向往柱洞，直径在10厘米左右。在房屋四周也发现少许往柱洞，有的是斜向往柱洞，朝向房屋一侧。坑内的堆积出现分层现象，多则七八层，少则两层。坑内普遍堆积大量红烧土块，红烧土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有的一面平整光滑，另一面凹凸不平，在光滑的一面戳有小窝，起到装饰作用；有的表面印有植物印痕，能看出有枝条、小木棍、草叶等。房址内出土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烧骨等。陶器有红顶钵、鼎、罐、彩陶瓮等；石器有石磨盘和石磨棒以及石斧等；骨器有骨锥、骨针等。屋内大量红烧土块可能是房屋倒塌堆积造成的。除了房址以外，也发现有烧土坑，如H49、H6等，坑内亦发现大量红烧土，烧土上有植物印痕，推测这些烧土坑的性质也和居住有关。

墓葬发现5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墓向基本一致，在185°~210°之间，基本无随葬品，只有M3在墓主的右脚外侧随葬一件彩陶壶。M1、M2、M4的墓主均为成年男性，年龄40~50岁。M3墓主是年龄为12岁左右的小孩，性别不明。墓主在埋葬时双手放置在臀部下，这一埋葬习俗较为特殊。

瓮棺葬发现3座，平面形状可分为椭圆形和近圆形，W1为横置，葬具为一陶瓮，葬具内发

现有小孩的骨骼和牙齿，随葬一件石英块。W2为竖置，两鼎相扣，上下鼎口沿略有错位，鼎内未发现小孩骨骼。W3也是竖置，为一小鼎倒扣在土中，未发现婴孩骨骼。

灰坑以H12为代表，平面呈椭圆形，坑内堆积可分为六层。第①层为红褐色黏性土，土质较疏松；第②层为黑褐色黏性土，土质较致密，包含大量红烧土块；第③层为灰黄色沙质土下夹杂灰褐色土，土质由致密到疏松；第④层为红烧土层，土质致密；第⑤层为灰黑色土，土质疏松；第⑥层为浅灰色土，土质较疏松。H12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石器、骨器、动物骨骼等。可辨器形有钵、鼎、红陶罐、小口壶、器盖、石斧、骨锥等。动物骨骼有鹿、獾、鱼椎骨、鱼刺等。

第三期遗存 本期发现的遗迹只有灰坑一类，以H21、H39为代表，坑口呈圆形，为口大底小的袋状坑。底部平整，围绕坑底四周放置一圈石块，推测在石块上铺设木板，然后在木板上放置食物，以起到防潮的作用。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 etc，可辨器形有夹砂篮纹罐、豆、壶、石环、石刀、磨盘等。

年代与性质

第一期遗存H48采集的碳样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为8369~8063年；第二期H12采集的骨和碳样的测年距今6265~5997年和6185~5936年；第三期H14采集的碳样测年为距今5580~5324年。

南盘石第一期陶直腹盆（H52:1）的形制与北福地一期文化的直腹盆（T1③：9）形制相似，口沿下纹饰的组合有区别。因此，南盘石第一期文化遗存与北福地一期关系密切。不过南盘石一期只发现直腹盆，不见支脚。另外南盘石一期陶器口沿下的纹饰与徐水南庄头陶器口沿下的纹饰相似。加上南盘石一期的碳十四测年超过距今八千年，这些迹象表明南盘石一期的年代在徐水南庄头和北福地一期文化之间。南盘石第二期发现的陶鼎、红顶钵、陶盆、小口壶、彩陶钵以及彩陶上的纹饰，与正定南杨庄、安阳后冈、濮阳西水坡的同类器形制一样，结合碳十四年代数据，南盘石第二期遗存为典型的后冈一期文化遗存。南盘石第三期文化遗存不见彩陶，以夹砂篮纹罐、泥质黑陶豆为代表，从陶器形制来看，处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过渡时期，大致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同时期。不过南盘石第三期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与陶器特征反映的年代有出入，显然碳十四的年代明显偏早。

学术价值与意义

首先，南盘石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为首次在邢台地区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的文化遗存。发现的陶器在器形上与北福地一期更为接近。因为未发现支脚，加上陶器纹饰与南庄头有相似之处，因此南盘石一期遗存较北福地一期遗存可能更为古老。在地域上，将磁山文化和北福地一期文化连接起来，起到了中间桥梁的作用，也为厘清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材料，具有填补地域空白的的作用。另外，近年行唐故郡遗址也发现了直腹盆、支脚等这一阶段的典型遗物。上述最新发现表明太行山东麓地区距今七八千年前遗存的分布是相当普遍的，对于进一步探讨太行山东麓地区文化发展演进及文明起源等关键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其次，南盘石第二期文化遗存为我们展现了较为完整的后冈一期文化聚落形态，发现了房址、灰坑、墓葬、瓮棺葬等遗迹。根据墓葬集中分布的情况以及与东边的遗迹有一定的距离，推测发掘区的西南角为专门的公共墓地。瓮棺葬主要分布在居住区，用于埋葬未成年孩童。南盘石遗址普遍流行将死者的双手压在盆骨下的习俗，在后冈一期文化其他遗址中少见，不过在1972年春安阳后冈的发掘中，M15的墓主左手掌压在盆骨下，与南盘石的葬俗有相似之处。此外南盘石M3随葬一件网格纹彩陶壶，保存完好，制作精美。在以往后冈一期文化的墓葬中几乎不见随葬品，M3的发现为我们认识后冈一期文化的埋葬习俗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这些发现为复原并阐释后冈一期文化的聚落形态、丧葬习俗、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科学的实物材料。

总之，南盘石遗址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基本涵盖新石器时代各个阶段的遗存，为构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年代标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邢台市文物保护和研究中心 临城县文物保管所 执笔：李彦英 张文珊 索丽霞 李军 马立志 冯宝 牛东伟）



2021年3月至2024年12月，为配合海宁经编产业新材料创新基地投资项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海宁市文保所，对项目涉及的朱福浜遗址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全面考古发掘。揭露面积共计1430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581个，出土各类遗物1384件(组)。文化堆积包含崧泽、良渚、商周、唐宋、明清等多个时期，以史前时代的崧泽—良渚文化遗存为主，反映出此地曾经是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一处大型基层村落。

朱福浜遗址的分布范围约2万平方米，保存形态不规则，被古河道分割成三个片区：西北部一小块，东北部一大块，中间为西南—东北向长条形的核心区。西北片揭露崧泽文化土台2个、房址3处、灰坑4个、墓葬3座，良渚文化土台1个、灰坑9个、墓葬10座；中间核心区清理崧泽文化土台8个、房址3处、井窖1个、灰坑40个、墓葬51座，良渚文化土台3个、房址6处、灰坑78个、灰沟2条、墓葬82座；东北片揭露良渚文化土台7个、叠石圈1个、灰坑9个、墓葬7座。

史前聚落从崧泽晚期延续至良渚晚期，其中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衔接较为紧密，遗迹也相对丰富。文化堆积整体由南往北、自西向东发展，崧泽文化遗存多见于南部和西部，东北片仅见良渚文化遗存。每个片区相对独立，以人工土台为依托，居址多位于土台中部，周边有灰坑、灰沟、井窖等相应的生活遗迹。墓葬也埋在居址附近，排列有一定秩序，或成组，或成排。这种居葬合一的分布格局，体现了浙北地区崧泽、良渚文化常见的聚落形态。

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土台分别为10处和11处，两者数量相近，堆筑方式也一致，皆以黄褐斑土、灰褐斑土等多层堆叠，有的夹杂较多红烧土颗粒，局部似有夯筑迹象，残存厚度35~140厘米。部分良渚土台系在崧泽土台基础上扩建而成。土台面积大部分为120~1200平方米，崧泽时期最大土台面积为1260平方米，良渚时期最大土台面积积达4200平方米。

崧泽时期与良渚时期的房址数量相同，皆6座。建筑形式也相似，长方形地面建筑为主，多残留成排的柱坑，有的尚存基槽，或铺有红烧土垫土，面积8~42平方米不等。崧泽时期F5保存较好，呈长方形，面积约33平方米；室内铺有红烧土垫土，柱坑16个，分三排，排列较整齐，坑径30~50厘米。崧泽时期F11面积约14.6平方米，残存9个柱坑，分三排布列。崧泽时期F12位于F11东侧，面积约42平方米，也分三排，残存17个柱坑，部分可见柱基痕迹。F12是在F11坡相生活垃圾上堆筑

黄土新建的房址，反映了建筑空间扩展和更迭的过程。良渚时期F6有倒塌的红烧土墙基，平面呈长方形，内有隔墙，面积约22.7平方米；4个疑似碌墩的硕大柱坑呈规则的长方形排列，且位于建筑中央，直径40~66厘米，深50~70厘米，间距95~145厘米，坑内填埋大量红烧土块。

叠石圈遗迹位于东北区台Ⅵ中心，直径3.6~3.8米，以大小不一的石块垒砌，边缘整齐，墙体宽约0.5米，残高0.6米。石圈内散落着成堆的碎石块，应是构筑物倒塌所致。这是继皇坟台遗址之后再次在海宁地区发现叠石圈，而且保存较完整，又位于小型土台顶部，推测是一处粮仓基础。该遗迹最终被整体打包提取。

崧泽文化墓葬共55座，墓向多数朝南，有5座朝北。墓坑长126~278厘米，宽45~94厘米。墓内随葬品1~11件，平均每墓4件。M16是个特例，墓坑内未见任何随葬品，只有一大一小两具骨架；大骨架保存较好，为成年男性，小骨架保存较差，性别难辨；推断此为父子或父女合葬墓。随葬品共计219件，其中陶器182件、石器14件、玉器23件。陶器有鼎、豆、釜、深腹双鼻壶、罐、盘、盆、杯、纺轮等；石器以石钺为主，另有个别石镑、石铍和石纺轮；玉器有锥形饰、坠饰、端饰、玉管、串珠、隧孔珠、玉片、玛瑙瑗片等。M146出土灰陶罐套置于红陶钵内的一组器物，灰陶罐肩部带有凸棱并饰有12枚乳钉，器形罕见，其功能可能与祭祀有关。

良渚文化墓葬共99座，墓向绝大多数朝南，仅3座朝北。墓坑长160~260厘米，宽60~98厘米。另有8座墓坑长度小于120厘米，当为小孩墓。墓内随葬品0~16件，平均每墓5.4件。随葬品共计536件，其中陶器418件、玉器66件（组）、石器52件。陶器有鼎、豆、罐、双鼻壶、盘、盆、簋、壶、杯、宽把杯、尊、纺轮等；石器有钺、铍、刀、镰、纺轮、砺石等；玉器有琮、镯、耘田器、锥形饰、坠饰、串珠、隧孔珠、管等。M25出土8件随葬品，包含两件黑色的线轮状石器，出土时紧贴，大小和造型一致，圈槽内有明显的锉痕。M47随葬品9件，其中8件为陶器，另1件为双鼻壶形状的玉坠，殊为奇特，其形态与带盖双鼻壶酷似，颈部还琢刻了三道装饰性凸棱，通长2.9厘米。此壶形玉坠位于墓主胸部，出土时突梗朝向墓主头端，表明原来佩挂于胸前。M133随葬品仅12件，却出土了一件罕见的玉琮。此琮出自墓穴中部，单节，造型规整，饰简化人面纹，受沁严重，表皮大部分剥落，局部尚存玻璃光泽；器高7厘米，射

径8.9厘米，孔径6.5厘米。值得关注的是，该玉琮的鼻饰为交叉平行线刻纹，突破了常规鼻饰的范式。

此外，中区北部发现一座富林时期的墓葬M49，随葬品仅4件，分别为鼎、印纹钵、黑陶杯和红陶觚。黑陶杯造型修长，胎壁极薄，颇似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

崧泽文化灰坑呈圆形、椭圆形和长条形，直径85~330厘米，深48~170厘米。其中H122出土3件陶壶，皆完整，疑似窖藏。良渚文化灰坑呈椭圆形、长条形、不规则形等，直径55~285厘米，深18~78厘米。H55较为特殊，平面近圆形，直径约80厘米，深10厘米，内设一直立的陶罐，罐内置一枚陶纺轮，罐顶部倒扣一件圈足盘，其功能应为祭祀坑。

经过初步整理，最近在东北片发掘区的良渚文化地层陶片中出一件陶质房屋模型，与余杭下家山遗址发现的房屋模型酷似。该器物以夹砂细红陶捏塑，屋顶呈四面坡，有屋脊，也有屋檐，一侧坡面残缺，少部分墙体尚存。每一坡面均有一个鼻子状的细长气窗，坡面刻有字形交错的细密平行直线，表明屋顶覆盖着某种编织物。整器俯视近方形，残长4.9厘米，宽5.3厘米，屋顶残高3.5厘米，带墙残高4.5厘米。该房屋模型比下家山的房屋模型略小，胎体更薄，制作也更精细。可惜墙体部分残缺严重，依然无法判断当时房屋的墙体高度与屋顶的比例，以及门与窗的布局和形制。无论如何，这一发现再次证明良渚时期的主流房屋形态应为带气窗的四面坡屋顶，对于还原当时的建筑样式具有重要价值。

海宁地区史前遗址众多，经过大规模发掘的有达泽庙、小兜里、皇坟头等。朱福浜遗址是海宁地区史前时期又一个颇具规模且得到完整发现的基层展现村落，文化遗存以崧泽—良渚文化为主，它所反映的聚落模式和演变轨迹，是嘉兴地区史前社会发展轨迹的经典案例。同时也发现了一些罕见的遗迹和特殊器物，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探究。它的陶器群与良渚遗址群有诸多相似性，两者之间或存在某种关联。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执笔：赵晖 秦锐 程泽恩 田野晨曦）



江苏南京六合高余村发掘240余座战国至明清墓葬



高余村墓葬航拍

腐朽不存，仅有牙齿残留。边箱内出土陶纺、陶环、陶鼎、陶豆及铜器。

M188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20°。墓坑长2.60、宽1.70、残深0.70米，直壁平底。葬具为一椁一棺一边箱，椁痕长2.18、宽1.05、残高0.16米。棺痕长1.98、宽0.56、残高0.16米。边箱长2.18、宽0.32、残高0.16米。仅发现棺内底部距东南部有牙齿残留，头向东南。边箱内出土陶罐四件、陶壶两件、陶鼎、陶盒、陶甗、陶壶各一件，棺内底部出土铜镜一件。

M220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303°。墓坑长3.40、宽1.64、深1.50米，直壁平底。葬具为两棺一椁，皆已腐朽殆尽，朽痕较明显。椁长2.84、宽1.56、残高0.20、厚度0.06米。椁内南北并列两棺，北棺长2.08、宽0.64、残高0.20、厚0.05米。南棺长2.04、宽0.60、残高0.20、厚0.05米。墓主骨骼已腐朽殆尽，头向、年龄、性别不详。南棺出土铁剑、铁刀、铜带钩、口合、鼻塞各一件，铜钱数枚；北棺出土一枚铜钱和若干陶饼；椁椁之间出土陶罐四件、陶甗、陶鼎、陶盒、陶壶各两件，石磨、陶井、陶灶各一件。

除大量汉代墓葬外，此次还发掘有唐代至明清时期墓葬82座。其中唐宋元时期墓葬14座，明清时期墓葬68座。

M238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164°。墓坑长2.20、宽0.84、深0.30米，直壁平底。葬具为一木棺，棺长1.70、宽0.48、残高0.10米，仅存棺木朽痕及锈蚀的铁质棺钉。墓主骨骼已腐朽殆尽，仅存朽痕和部分牙齿，可辨认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南，年龄性别不详。墓内出土青釉瓷碗、青釉罐、黄釉净瓶、黄釉罐、铜钱、花钱、砚台、黄釉象形埴、玉龟、玉玦琕等随葬品，通过

器物时代特征判断墓葬年代为唐代。

M39为竖穴土坑砖室墓，方向29°。墓坑为长方形，长2.30、宽0.80、深0.70米，直壁平底。砖室近似梯形，内长1.92、内宽0.24~0.44、深0.70米。砖室顶部已破坏无存，四壁单砖横砌，错缝砌筑于生土上，无铺地砖。用砖尺寸长20、宽18、厚6厘米，素面无纹，质地酥软。墓底葬具、人骨、随葬器物均无。根据墓葬形制判断，墓葬年代为唐末时期。

M17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4°。墓坑长2.66、宽1.10、深1.20米，直壁平底。葬具为一木棺，已腐朽，残存部分棺板，板上有黑色漆皮，棺长1.84、宽0.60~0.70、残高0.30、板厚0.08米。墓主骨骼已腐朽，仅存部分牙齿，可辨头向北，其年龄、性别不详。棺内出土有铜钱、铁器，棺外头部出土韩瓶、“至正五年”木床朱书买地券。

M5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5°。墓坑长2.46、宽1.00、深0.48米，直壁、平底。葬具一棺，仅存棺痕，长1.80、宽0.78、残高0.12、厚0.07米。棺内葬有一人，头向北，骨架腐朽。墓内出土陶罐、青花瓷碗。

此次发掘前后历时8个月余，共发掘清理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241座，出土各类材质随葬品1100余件(套)。发掘汉墓数量最多，年代上限可至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最晚者可到东汉早期，序列基本完整。唐宋元时期墓葬数量虽少，但年代特征相对明显，可为六合地区唐宋时期墓葬资料提供重要补充。尤其元墓中出土的“至正五年”朱书地券等器物，为探究六合地区历史地理沿革提供新的实物资料。

高余村墓葬周边历史遗迹及考古成果丰富。走马岭、楠木墩汉代遗址位于发掘地点东北约2.5千米处。近年来，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高余村周边的李家岗、高余一组、高余二组、高余三组、马营、高庄、汪庄、龙虎营等地点进行数次发掘，累计清理战国至明清墓葬700余座，汉墓数量占比最大。初步研究发现，该区域在汉代应是一处重要的墓葬埋藏区，墓葬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为汉代堂邑侯国、堂邑县治的探寻，提供了新的线索。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执笔：于通海）

浙江海宁朱福浜遗址：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又一大型聚落